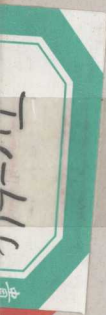


# 圆明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

1979.



## 前 言

1978年，国家建委和北京市建委负责同志召集有关单位就圆明园遗址的利用和如何为旅游事业服务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要求几个规划设计单位提出规划方案。我们在作这项规划设计方案的同时也曾进行了一些调研，这个小册子辑录的三篇文章及附图就是这一阶段工作的初步成果。由于时间短促，工作做得很粗糙，见解也十分肤浅。切望能得到园林界、建筑界以及关心圆明园的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1979年7月

## 目 录

圆明园的兴建及其造园特点·····	周维权 (1~10 页)
圆明园的毁灭及其现状·····	姚同珍 (11~15 页)
圆明园规划初探·····	城市规划教研组 (16~21 页)
后记·····	吴良镛 (22~23 页)

# 、圓明園的興建及其造園特點

周維權

圓明園歷經清雍正、乾隆、嘉慶三朝近一百多年的經營，它的成就代表着我國後期封建社會造園發展史上的一個高峰，但同時也是終結的標志。所謂“乾嘉盛世”的表面繁榮掩蓋着尖銳的階級矛盾和四伏的危機；不久，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通過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了古老封建鎖國的門戶。咸豐十年（1860）英國侵略軍焚毀圓明園，從此以後就再沒有出現過這樣規模和氣魄的營建活動，而園林藝術本身隨着我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也逐漸進入一個沒落和混亂的時期。圓明園的興建、焚毀以及此後所遭受到的種種摧殘恰好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近現代歷史的盛衰消長。

圓明園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庭園。它不僅是皇帝避暑、游憩和較長時間居住的地方，也是處理朝政、進行各種政治活動的場所，在園林的前部還建置一個具有“外朝”和“內寢”的宮廷區。因此，它既不同於大內御苑，和一般的行宮、賜園也不一樣。這種兼具“園苑”和“宮廷”雙重功能的園林是清代皇家庭園中的一種特殊型制，可名之為“離宮型皇家庭園”。

離宮型皇家庭園的興建與清代帝王園居的傳統風習有直接關係。

清王朝入關定都北京之初，來自關外的滿族統治者很不習慣於北京的炎夏氣候，曾有擇地另建避暑宮城的擬議〔注一〕。但開國之際、百廢待興，這種願望一時難以實現。康熙初年，北京大內遭火災後重修。為了防火、也可能為了防范宮廷暴亂而將各宮院之間以高牆隔絕開，形成許多封閉的院落，很不適宜於居住。康熙帝玄燁早就打算選擇一處清靜空曠的環境另建“避喧聽政”長期居住的地方。只是當時南方尚在用兵，政府財力不足。待到康熙中葉三藩叛亂平定、全國統一。明末以來大動亂之後出現一個比較安定的局面。經濟有所發展，政府財力也比較充裕，於是玄燁立即着手在北京的西北郊修建清代的第一座離宮型皇家庭園——暢春園。

北京西北郊泉水充沛，有西湖、玉泉山、西山諸名勝，優美的風景很富於江南情調。在明代已經就是私家庭園薈萃之區，海淀以北的丹陵汛一帶尤為集中，著名的勺園和清華園就在這裡。清華園是明代皇親李偉的私園，面積約一千一二百畝，位於今北京大學的西南、京頤公路西側。暢春園即利用清華園舊址的十分之七，大約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建成。玄燁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這裡。從此以後，清代帝王園居遂成慣例。

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熱河上營（承德）興建規模更大的第二座離宮型皇家庭園“避暑山莊”，四十七年（1708）完工。

圓明園是清代的第三座離宮型皇家庭園。乾、嘉時期，它与暢春園，萬壽山清漪

园，玉泉山静明园和香山静宜园合称为“三山五园”。这些大型的皇家园林连同附近的十几座皇室和官僚的赐园，形成北京西北郊园林建设空前兴盛的局面〔图一1〕。

圆明园在畅春园的北面，早先是明代的一座私家园林。清初曾将北京西北郊的许多前明私园收归内务府奉宸院，再分赐给皇室成员和贵族官僚。圆明园就是康熙四十八年赐给皇四子胤禛的一座“赐园”。园内“林泉清淑，波淀淳泓”〔注二〕，是以水面为主体的水景园。康熙六十一年（1722），胤禛曾携皇孙弘历进谒玄烨于园内的“牡丹台”。此处后来改名“镂月开云”〔注三〕，位于后湖的东南角上。当时西北郊的赐园大都利用充足的供水条件而以水面作为园的主体，它们的规模不能超过皇帝居住的畅春园。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测康熙时圆明园的具体范围大致是后湖和前湖及其周围、面积为六百亩左右的略近方形的地段。园门设在南面，与前湖、后湖恰好有一条南北中轴线上，成较规整的布局〔图一2〕。

玄烨死后，皇四子胤禛即帝位。于雍正三年（1725）将他的赐园圆明园改为离宫型皇家园林，因而大加扩建。扩建的内容包括四部分：

第一部分：将中轴线往南延伸，在原赐园的南面“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待直诸臣有亲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注四〕。此即“外朝”部分，共三进院落。第一进为大宫门，左右外朝房和内阁内府各衙门的值房。第二进为二宫门“出入贤良门”、左右内朝房和茶膳房，缮书房，清茶房，军机处值房。第三进为正殿“正大光明殿”。正大光明殿之东为“勤政亲贤殿”，是皇帝日常接见臣僚的地方。

第二部分就原赐园的北、东、西三面往外拓展。利用原来多泉的沼泽地改造为河渠水网，构成许多水流萦回、岛堤穿插、堆山障隔、以建筑群组为中心的局部园林空间。

第三部分即福海及其周围配置的建筑群组。

第四部分是沿北宫墙的一条狭长地带，从地形和理水的情况看来，后期添建的痕迹是显然的。

扩建后的圆明园面积达三千余亩。据《日下旧闻考》的记载，乾隆时期命名的“四十景”中有二十八“景”曾经胤禛题署过。这就是说，雍正时的圆明园已经有二十八处重要的建筑群组即：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澹泊宁静、多稼如云、濂溪乐处、鱼跃鸢飞、西峰秀色、四宜书屋、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夹镜鸣琴、廓然大公、洞天深处〔图一3〕。

原经由畅春园北流入园的万泉庄泉水已不能满足开拓后的圆明园用水的需要。除利用园内地下泉水之外〔注3〕，又复导引玉泉山之水，在园的西南角与来自畅春园之水汇合，转而沿园西墙北流，从园西北角的闸口导入园内，构成新的水系。顺自然坡势自西而东，再从园东北角闸口流出园外。西直门到畅春园的“御道”也往北延伸，经过大红桥一直铺设到园正门前的广场。

为了加强圆明园的保卫，于扩建该园的同时，由京师的卫戍部队护军营八旗中，分拨出“圆明园八旗”，每一旗有官兵三千余名。此后又从内务府分拨成立“包衣三旗”，有官兵一百余名。各旗均设置营房、校场、箭亭。镶黄旗驻树村西、正黄旗驻肖

家河北、正白旗驻树村东、镶白旗驻树村西、~~正红旗驻安河桥西~~、镶红旗驻青龙桥西、正兰旗驻成府东、镶兰旗驻兰靛厂西、包衣三旗驻成府东。环绕着圆明园而形成一個严密的拱卫系统，并设“推拨”（即哨所）百余处、日夜巡逻警戒 [图—3]。

乾隆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繁荣时期。清高宗弘历作为这个“盛世”的君王，附庸风雅、喜好冶游，自谓“园林之乐、不能忘怀”（《静宜园记》）。挟持皇室剥削得来的富厚财力，以空前的规模修造园苑供一己享用。他曾先后六次到江南巡视，遍游江南的胜景名园。终其一生，在他所经营的皇家园林中，对于再现江南风致和园林艺术之美，始终是不遗余力，不惜工本。所以，这时候的北京西北郊园林，在康熙以来百余年间所积累的造园设计和施工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得以更广泛地结合江南造园艺术而互相融洽，从而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弘历以畅春园作为皇太后居住的地方，他自己仍以圆明园为离宫。因此对该园又进行了第二次的扩建。这次扩建并没有再拓展圆明园本身的地盘，而是在原来的范围内调整园林景观并增建若干建筑群组以丰富园景。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十二处即：曲院风荷、坐石临流、北远山村、映水兰香、水木明瑟、鸿慈永祐、月地云居、山高水长、澡身浴德、别有洞天、涵虚朗鉴、方壶胜景。联同雍正时原有的二十八处，共成“四十景”。另在它的东邻和东南邻建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 [图—3]。

圆明园的扩建大约在乾隆九年（1744）告一段落。这一年弘历命供奉内廷的画师唐岱、沈源等绘成绢本设色的“圆明园”四十景图。

长春园建成时间最晚当在乾隆十六年 [注五]。距圆明园扩建的大体完工只有五六年，据《日下旧闻考》的记载，长春园内的一些主要建筑群的建造年代还要更早些 [注六]。从时间上来判断，长春园的建造，并非象弘历所说“予有夙愿，若至乾隆六十年寿登八十五，彼时亦应归政，故邻圆明园之东，预修此园，为他日幽游之地” [注七]，而实际上是作为圆明园扩建的一部分。弘历在乾隆六十年“归政”以后亦并未住此而是住在大内的宁寿宫。

长春园北面有单独的一区欧洲式宫苑“西洋楼”。当时，许多欧洲籍的耶苏会传教士以画师的身份供职如意馆。西洋楼就是弘历命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王致诚等人设计监造的 [注八]。乾隆时期，我国境内的欧式建筑只有澳门、广州等地的商馆、住宅和內地的少数天主教堂。沿海一带的某些商业城市，也有摹仿欧洲建筑样式和细部装修的。如象扬州园林建筑中的“澄碧堂”，“水竹居”以及西洋墙、西洋钩子，西洋拨浪等 [注九]。圆明园內的“水木明瑟”有所谓“泰西水法”。据《圆明园工程做法则例》记载，园內建筑物也有采用欧式细部的如西洋索子井（天花），西洋如意栏杆、西洋踏跺级石等，大抵皆间接仿自扬州。而在皇家宫苑之内，由欧洲人设计监造成片的欧式建筑则尚属首见。但这只是出于弘历的猎奇心理，在园林的总体规划上并无足轻重。就全园而言，也不过是局部的点缀而已。

绮春园大约建成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注十]。是由几个小园林合并而成，其中包括大学士付恒及其子福康安死后缴进的赐园。嘉庆时又把庄敬和硕公主的赐园“含晖园”和成亲王寓园并入绮春园之西路，共成“绮春园三十景”。道光时改名“万春园”。

圆明、长春、绮春三园同属圆明园总管大臣管辖。后两者是前者的附园。因此，一般通称的圆明园也包括长春、绮春二园在内，总面积约五千余亩。

圆明园是在平地上全部由人工创造的大型园林。如此大面积的平地造园，实为中外所罕见。可惜园已毁圮，有关园景的描述只能在经皇帝特许能够进入圆明园的欧洲传教士的信札中见到一鳞半爪。所幸遗址尚存，利用间接材料如象同治年间重修时的图纸和烫样、《日下旧闻考》一类官书、四十景图和御制诗文等结合遗址加以分析映证，尚能得到这座园林的规划设计方面的轮廓概貌。大致可以综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圆明园占地广、规模大。为着适应帝王宫廷生活和园居生活的需要，建筑物的数量多、类型复杂。建筑布局也相应地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方式，把绝大部分的建筑物集中为许多小的群组再分散配置于全园之内。这些建筑群组之中，一部分具有特定的使用功能如象宫殿、住宅、庙宇、戏楼、辅助设施等。大量的则是供一般饮宴、坐憩之用的园林建筑。以一个建筑群组为中心结合地貌环境和植物配置而构成一“景”，所谓“四十景”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果把分散在圆明园内的全部建筑群组按照它们在园林造景方面所起的作用加以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风景点，小园，建筑群。

所谓风景点就是单幢的或成组的建筑物与开敞的或比较开敞的地貌环境相结合，其作用在于“点景”即点缀风景或“观景”即观赏风景，或者兼而有之。

小园就是成组的建筑物与叠山理水或天然地貌所构成的幽闭或比较幽闭的局部空间相结合，形成一个在布局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体形环境，无论设置墙垣与否，都可以视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园林即“园中之园”。小园在许多情况下也兼有风景点的作用。建筑群即那些既非小园亦非风景点的普通建筑群组，一般都为北方常见的院落组合形式，具有特定的使用功能。

圆明园的总体规划采取风景点，小园，建筑群和景区相结合的方式。所谓景区就是按景观特点之不同而划分的较大的单一空间或区域，包含若干风景点、小园或建筑群在内。全园共有两个景区即以福海为主体的福海景区和以后湖为主体的后湖景区，其余的地段内则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小园和建筑群。前湖以南的若干建筑群属于宫廷区的范围，后湖以北则为一个庞大的小园集群区。这个总体规划为广阔的大面积平地造园创设了丰富多样的园林景观，是园林规划上的一个创新。但它的形成也有其历史的原因。

圆明园在前此的五六十年来经过多次的扩建。康熙时的原赐园是一座小型的水景园，以略近方形的后湖作为中心。后湖、前湖、园门三者构成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雍正扩建时大大地拓展了园的范围，成为一座离宫型皇家园林。但仍然保持水景园的特点，利用环绕于后湖的北、东、西三面的沼泽地带开辟出许多互相联缀的小型水体。这种做法可能出于施工的方便，也可能有规划上的考虑。但其效果却有如众星拱月、烘托后湖作为中心水面的突出地位。这一带的小型水体则为建置小园创设了条件。福海是全国最大的开阔水面而且具有“一池三山”的象征寓意，却偏处一翼居于从属的地位。因此，全园的中心仍然保持在原赐园的中轴线上。这条全园唯一的中轴线由于它的南端加建“外朝”、中部加建“九洲清宴”、而更形突出。乾隆年间的再次扩展之所以不采取继续拓展地盘的方式，固然为了避免园林范围过大而造成管理上的困难，但也很可能在

规划方面考虑得更多一些，可能预计到园林地盘的再度拓展会带来总体的零乱而破坏了原规划的完整性。假若设想往西拓展，势必在西南角上碰到瓮山（即万寿山）的北麓，正当山之阴坡。此种地貌并不利于园林造景。往北开拓又会形成过大的纵深。往东拓展则横向延伸太长而容易出现布局的松散枝蔓。故尔采取就地增设园景和另建附园的办法。

第二、作为水景园的圆明园，人工开凿的水占全园面积的一半以上。园林造景大部分是以水为主题。水面大中小相结合。大水面如辽阔的福海宽达六百余米。中等水面如后湖宽二百米左右，具有较亲切的尺度。其余的众多小水面宽度均在四五十米至百米之间，是水景近观的小品。回环萦流的河道把这些大小水面串联为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构成全园的脉络和纽带，在功能上提供了舟行游览和水路供应的方便。这个水系与人工堆山和岛堤障隔相结合所创造的地貌景观，其本身就是江南水乡的全面缩影和再现。这是人工造园的一个杰出作品因而也是圆明园的精华所在。其中有许多地方甚至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例如“四十景”中的上下天光〔图一4〕“垂虹驾湖，蜿蜒百尺。修栏夹翼，中为广亭。靛纹倒影，混漾楣槛间，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注十一〕，是取法于云梦之泽。“坦坦荡荡”“凿尺为鱼乐园，池周舍下，锦鳞千头，喁喁拨刺于荇风藻雨间，回环游泳，悠然自得”〔注十二〕，显然仿自杭州的玉泉观鱼。甚至西湖十景也全部加以摹写。此外还有取法于诗文意境的，如“夹镜鸣琴”“取李青莲两水夹明镜诗意”〔注十三〕，“北远山村”寓意于王维田家诗等。

堆山约占全园面积的三分之一。人工堆叠的山不可能太高峻，从遗址看来，最高的也不过四五丈，但却有不少江南名山的摹拟。如象“慈云普护”“殿供观音大士，其旁为道士庐，宛然天台石桥幽致”〔注十四〕，是为天台山风致的缩写。“西峰秀色”“河西松峦峻峙为小匡庐”〔注十五〕等等。

这些景观如今已不能见其全貌，但从遗址的片山残水尚能依稀辨识缩移摹写的痕迹。圆明园的这整套堆山河湖水系也可以说是将平地造园的小中见大，尺咫丘壑的叠山理水手法在三千多亩的广大范围内连续地展开和延伸。正所谓“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注十六〕。这在我国园林中乃是绝无仅有的。如果加上长春、绮春二附园，则圆明三园真可以称得起集我国古典园林人工堆山理水手法之大成了。

第三、圆明园的主园与附园之间的主从关系很明确，园林规划方式亦略有不同。

附园之一的长春园也是一座大型水景园。但理水的方式却与圆明园不一样，利用洲、岛、桥、堤将大片水面划分为若干不同形式、有聚有散的水域。建筑的布局比较疏朗，中央的大洲上建置园内的重点建筑群“淳化轩”“蕴真斋”。它与隔湖北岸的风景点“泽兰堂”成对景，构成一条约略错开少许因而不大突出的中轴线。以此来强调其附园的地位。风景点都是因水成景的，水域的宽度一般在一二百米之间，能保证隔岸观赏的清晰视野。长春园总结了圆明园的经验，在地形处理、山水布局、水面尺度等方面更趋成熟，从遗址现状看来，这座园林在北方诸园中可以算是上品之作〔图一5〕。

长春园北面的欧式宫苑“西洋楼”是一个特殊的景区。包括四幢建筑物、三组大型喷泉、若干小喷泉以及园林小品，沿着园的北墙成带状展开〔图一3〕。四幢建筑物即



“谐奇趣”“方外观”“海晏堂”和“远瀛观”，都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风格的，但在细部和装饰方面也吸取了一些中国的手法。喷泉在当时叫做“水法”，是在中国园林里面第一次出现的一种新的理水方式。大型喷泉“大水法”是景区的中心，它与“远瀛观”和坐南朝北观赏喷泉的御座“观水法”构成一条南北中轴线，颇有勒诺特（Le Notre）式的庭园意趣 [图一6] [图一7]。“万花阵”摹仿当时流行于欧洲园林的迷宫（Maze）。“线法山”可能取法于欧洲中世纪园林里面的庭山（Mount）。“线法墙”则是利用透视学的原理以加大景深效果的一种观赏建筑小品。景区地段虽然局促但其总体布置却很有条理，大体上能够显示出西方古典园林和建筑的对称均齐的轴线关系。它们全部集中在沿北墙的一条不到一百米宽的狭长地带内。这显然是为了不致影响长春园的规划布局，也有可能出于“夷夏之别”的原因。

另一座附园绮春园由若干赐园合并而成，许多小型水面互助联缀构成水景。这是一座由许多小园穿插着几处风景点和建筑群而组织起来的以小园为主体的大型园林。

第四、圆明园内的“园中之园”数量很多。四十景中就有十九景属于小园的性质。小园占地大约为圆明园总面积的一半。大部分小园都能利用叠山理水所构成的局部地貌与建筑的院落空间穿插嵌合而求得多样变化的形式。小园之间有曲折的水系和道路相联络，而对景、泄景、透景、障景的安排也构成一种无形的联系。通过这些有形的联络和无形的联系，很自然地引导人们从一处建筑走向另一处建筑，从这一个体形环境达到彼一个全然不同意趣的体形环境。这种多样化的园景“动观”效果，较之单一园林空间的步移景异，其艺术感染力又自别具一格。耶苏会传教士王致诚对此有一段文字描写：“当人们沿着那些曲折的经过岩洞和亭子的小径离开一个山谷的时候，立刻会发现他又置身于另一个山谷之中，这里的地形和建筑与前者全然不同。所有的山丘都复盖着树林和花木，河道的驳岸都不象我们那里以打磨得很光滑的石块镶砌，而是以粗糙的极不规整的石块堆叠。堆叠枝巧极高，因此它们都很象天然的岩壑。河道时宽时窄，随着堆山叠石的脉络走向而形成许多大弯小转。岸边遍植花木，它们都是从岩缝里面长出来，仿佛自然生长的。花木四季不同。沿河岸边则以卵石铺成小路，它们从一个山谷导向另一个山谷。这些小路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沿河，有时又在山间穿行” [注十七]。

由小园集群所构成的园林景观，不仅体现在小园本身的设计上，也包含着它们之间的联络和联系的安排经营。这后者乃是圆明园规划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创造多样化的园景动观效果、把众多小园联缀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先决条件。如果安排经营不当，则会流于凌乱散漫，或者出现平淡乏味的简单的空间重复。从遗址的现状看来，圆明园靠西墙一带就可能存在这种情况。而后湖以北的小园集群区内，无论小园本身的设计以及它们之间的规划安排和位置经营一般都很不错。其中颇多佳作，试举数例：

“濂溪乐处”，据弘历《御制诗》序的描述：“苑中菡萏甚多，此处特盛。水殿数楹，流水周环于下。每月凉暑夕，风爽秋动，净绿粉红，清香不已。想西湖十里，野水苍茫，无此端严清丽也”。这是一处观赏荷花的地方。荷池的四周环以堤，堤外复有水萦绕。形成水绕堤、堤环水、岛屿居中的地貌形势。岛的位置偏于西北，让出曲尺形的水面以栽植荷花。岛上建“慎修思永”一组建筑群。南面临湖，北面障以叠山。更于东

南角上延伸出水廊“香雪廊”于水中，可以四面观赏荷池景色。这组建筑与湖南岸的“汇万总春”遥相呼应成对景。就小园的总体而言，是以层层虚实相间的山水空间环抱烘托建筑群的布局方式 [图—8] [图—9]。

“廓然大公”“西峰秀色”“鱼跃鸢飞”“北远山村”是四组相邻的小园，但却各具不同的特色。

廓然大公“平冈回合，山禽诸鸟远近相呼。后凿曲池有蒲菡。长夏高启北窗，水香拂拂真足开豁襟颜”（弘历《御制诗序》）。这个小园的布局是以三面的临水建筑环抱水池，池北岸则为叠山。池面形状曲折而有源有流。正厅“廓然大公”与叠山分居池之南北互成对景。正厅面北，可以观赏水池和对岸叠山之景。这种布局方式多见于江南宅园之中，上海的豫园、苏州的艺圃均属此类。小园周围的外圈，以回合的叠山平岗作为障隔，更加强了这个局部空间的幽邃气氛 [图—10] [图—11] [图—12]。

西邻为“西峰秀色”。它的布局与前者恰恰相反，是山与水环抱着建筑物。建筑群的北面和东面临水，取杭州西湖“花港观鱼”之意。南面和西面紧接一组叠山，“河西松峦峻峙为小匡庐”（《日下旧闻考》）“轩楹洞达，面临翠献。西山爽气在我襟袖”（弘历《御制诗序》）。乃是以近观仰视来求得有如庐山峰峦的峻峙气势，而又以远处的西山借景作为衬托 [图—13] [图—14]。

“西峰秀色”之北，隔墙为“鱼跃鸢飞”和“北远山村”。这个地区“曲水周遭俨如萦带，两岸村舍鳞次。晨烟暮霭，蓊郁平林。眼前物色，活泼泼地”（弘历《御制诗序》）。显示一派水村野居的景色，其布局与前者又不相雷同。建筑物沿着河流夹岸错落配置，显然是取法于扬州的瘦西湖 [图—10]。

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弘历在六次南巡中，凡是他所中意的江南园林，均命随行的画师摹绘成图，作为北方皇家园林建置的参考。所以圆明园的扩建在乾隆九年完成“四十景”以后也一直一直没有间断过。有些小园则直接以江南某园作为蓝本。如象圆明园内的安澜园（四宜书屋）、长春园内的小有天园、狮子林、茹园即分别摹仿当时江南的四大名园海宁安澜园、杭州小有天园、苏州狮子林、南京瞻园而建成。所谓“行所流连赏四园，画师仿写开双境” [注十八] 即指此而言。

直接摹仿江南名园的做法始于乾隆时期。这时期南北园林艺术的融洽可以说达到了高潮。弘历所喜爱的苏州狮子林甚至同时仿建于长春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内。正如他的一首《御制诗》所写的：“最忆倪家狮子林，涉园黄氏幻为今，因教规写闾城趣，为便帝王御苑寻”。但此种摹仿并非简单的抄袭而是“略师其意、就其天然之势，不舍己之所长” [注十九]，乃是结合北方的建筑形式、气候和绿化种植的特点来表现江南园林的意趣。但求其神似而不拘泥于形似，可以说是以北方雄健之笔舒写江南柔媚之情的一种因地制宜的艺术再创造，大大地丰富了北方园林的内容。因此，园中有园乃是圆明园的特点之一，而这些园中之园本身也成为我国古典园林中的一种独特形式。

圆明园内的两个主要景区各有不同的风格。福海景区以辽阔开朗取胜。福海水面近于方形，宽度约六百米。中央三个小岛上的风景点“蓬岛瑶台”略仿李思训仙山楼阁画意。河道环流于海的外围，时宽时窄、有开有合，通过十个水口沟通福海水面。这些水

口将漫长的岸线分为大小不等的十个段落。其间建置各式桥梁点缀联系，既消除了岸脚的僵直单调感，又显示出水面的源远流长。这十个段落实际上也就是环列福海周围的十个不同形式的洲岛。岛上的堆山把中心水面的开阔空间与四周的河道障隔开，以便于临水面的开阔地段布列风景点，充分发挥它们的“点景”和“观景”的作用。如象东岸的“接秀山房”甚至以园外西山的连绵峰峦的借景作为风景画面的主题。沿河道的幽闭地段则建置小园，通过水口的“泄景”引入福海的片段侧影作为陪衬。宫墙与河道之间亦障以土山，把这段狭隘的空间掩饰起来。

后湖景区的特点在于幽静。湖面约二百米见方，隔岸观赏环列之景，恰好在清晰的视野范围之内。沿湖的九个岛屿上建置九处形式互不雷同的风景点、小园和建筑群。既突出各自的特色，也考虑到彼此的成景。例如从东面的“天然图画”透过隔湖西岸的“坦坦荡荡”所构成的豁口，恰好能够观赏到园外万寿山后山借景的最佳风景图面。后湖景区位于全园的中轴线上，九个小岛有“禹贡九洲”的象征寓意。居中的则是“九洲清宴”一组大建筑群。因此，景区的布局于变化中又略具均齐严谨的意味[图—15]。

第五、圆明园的建筑无论平面形式，外观造型和群体组合都非常丰富多样，能够突破官式规范和则例的束缚而广征博采。如象精致的扬州“周制”内檐装修、许多欧洲建筑的细部做法乃至成组地建造欧式宫殿和园苑。这都是在其他皇家园林内所不经见的。圆明园内还收藏着大量的古笈、文玩、字画、珍宝、陈设和工艺品。它不仅是一座名园、也是一座综合的艺术宝库。它展示了我国封建文化的精萃，也体现着我国劳动人民智慧和创造的结晶。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追求享受园林之乐趣是封建帝王的奢侈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的话，那么，他们所占有的劳动人民的创造以作为一己享用的园林必然在规划设计上体现他们的意图和爱恶，造园思想中所反映出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是很明显的。这从圆明园以“四十景”为主的大小百余处建筑群、风景点、小园的设计特点、模拟对象和命名来考查，可以看出其所包含着的十分驳杂的内容：除了对江南园林和风致的大量缩移摹写之外，有象征“普天下之、莫非王土”的后湖九岛，有取材于佛经的如“珞迦胜景”“舍卫城”，有象征道家仙山琼阁的如“方壶胜景”[图—16]“蓬岛瑶台”，有标榜儒家孝行的“鸿慈永祐”[图—17]，有寓意四海承平的“九洲清宴”“海晏堂”“万方安和”[图—18]，有歌颂帝王德行的如“涵虚朗鉴”“茹古涵今”，有显示帝王重农耕的如“多稼如云”“北远山村”，有赞扬儒家哲人君子、隐逸出世的如“濂溪乐处”“廓然大公”“澹泊宁静”，有度藏四库全书的“文源阁”，有摹仿民间市肆的“买卖街”，还有欧式的宫殿庭园。而圆明园的命名按照胤禛的解释，“夫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注二十]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充分表现封建帝王“万物皆备于我”的腐朽意识。也可以说，这是儒、道、释作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之在园林艺术上的集中反映。

第六、大幅度的平地造园以及相应而出现的小园集群的规划布局是圆明园的特点，也是它在造园艺术方面的成就之一。但这种单纯在面上铺叙的小品集锦尽管展开的范围很大，毕竟不可能创造出具有身临其境的真实感的湖山景观。福海景区的辽阔，也由于

缺少比较高体量的山形配衬而不能显示浑宏的气度。所以说，在缺乏天然山水基础的情况下进行大范围内的平地造园，圆明园的规划虽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毕竟不能超越其先天性的局限。这也就是圆明园甫建成若干年后又在它的西面利用瓮山（万寿山）和西湖（昆明湖）的天然山水作为基础，修建另一座大型园林“清漪园”的主要原因。

圆明园不仅在当时的中国是一座最出色的大型园林，正如弘历所说：“天宝地灵之区，帝王游豫之地，无以踰此”[注二十一]。通过耶苏会传教士致罗马教廷的信函中对它的详尽而生动的描述，圆明园还被介绍到欧洲而蜚声一时，被誉为“万园之园”。十八世纪初叶的欧洲园林，正是所谓“勒诺特式”（Le Notre style）造园风格的盛行时期。园林布局讲究严格的对称均齐，一切的造园手段包括有生命的绿化种植都按照几何图案来安排。正当这种完全程式化的园林最风行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极端的倾向：标榜返朴归真完全抄袭天然风景而抹杀人工创造，即所谓“英国式”园林。它要求造园艺术脱离任何规律，“投身于诗人的自由怀抱……除了凭笈想象之外不再受其他法则的束缚”[注二十二]。这种园林和天然风景简直没有什么区别。通过传教士的介绍，欧洲人开始知道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造园艺术。这是一个既不同于勒诺特式风格也不同于英国式风格的全新的园林概念，犹如空谷足音，在欧洲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于促进欧洲园林的变革起了一定的作用。王致诚在一封著名的信函中详尽地介绍了圆明园之后写道：“此地各物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极浑伟和美丽。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相类的东西。因此也就令我特别惊讶……。中国人在建筑方面所表现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弘富。我们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不得不相信，我们是又贫乏又缺乏生气”。接着表示了他对勒诺特式极端程式化的园林的反感：“就我们而言，什么地方都需要划一和对称，不容许有独立自在的东西。如果越雷池一步，就不能容忍”[注二十三]。他认为中国园林能予人以一种画意的感受。建筑是作为景物的一部分而提出的，是对自然美的补充。他说：“这种园林景观是难以描述的。只能用眼睛去看，才能够领略它的真实内容”。当时欧洲的许多造园家也在研究中国园林，但都是零星片断，模糊失真。英国皇家建筑师张伯斯（William chambers）曾两度游历中国，根据他见到和听到的中国园林包括圆明园在内的情况，著文立说列举理由反对单纯注重自然风景的“英国式”园林。他主张园林艺术应该具有高于自然的特色。要多样变化以适应人们的各种心理状态。把自然界的形形色色概括于多方面而又统一的设计中，以此来表达反应各种情态。他在英国为肯特公爵（Duke of kent）设计的丘园（kew Garden）是欧洲的第一座所谓“中国式”的园林，也是他受到中国造园艺术的启发而形成的新园林概念的具体实践。尽管似是而非甚至不伦不类，仍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成为冲击勒诺特式传统的一股潮流。

今天的圆明园，地面上的建筑物虽然早已荡然无存。但遗迹尚在，特别是它的精华所在的河湖水道体系和堆山叠石大体上仍然完整。也就是说，作为造园的地貌基础是存在的，圆明园并没有湮灭。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国内外到北京游览观光的人数今后将大幅度地增加。北京作为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它的许多名胜古迹应该逐步地加以整理、修复、开放乃势在必行。圆明园在它的全盛时期曾经是一个蜚声国内外的名园胜苑。勤

劳智慧的造园匠师和劳动人民创造了它，封建帝王攫以为一己的享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军烧毁了它，反动政权又继续加以摧残。在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留下的这些遗迹是否任其毁灭下去，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逐步地恢复、利用圆明园不仅能增加新的旅游区 and 再现一处极有价值的名胜古迹。而且有着政治上的意义。

如果说，圆明园在过去的兴衰反映了我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侧面。那么，我们衷心地期望它今后的新生也将从一个侧面体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新页。

---

[注一]《东华录》：“（顺治七年）七月乙卯。摄政王谕，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碱。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效前代建山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

[注二] 胤禛《圆明园记》

[注三]《日下旧闻考》“缕月开云楠木殿，覆二色瓦，焕若金碧，原名牡丹台。乾隆九年更今名”

[注四] 胤禛《圆明园记》

[注五] 据《清史稿》职官志“乾隆十六年，置六品总领一人”。

[注六]“澹怀堂”和“含经堂”建于乾隆十四年以前。见《日下旧闻考》。

[注七] 乾隆三十五年《御制诗》自注。

[注八] 郎世宁 (Joseph Castiglione) 意大利人；蒋友仁 (Michel Benoist) 法国人；王致诚 (Attiret) 法国人。

[注九] 向达：《圆明园罹劫七十周年纪念述闻》

[注十] 乾隆三十七年置绮春园总领，隶属于圆明园总管大臣。估计绮春园当于是年建成。

[注十一] 弘历《御制诗序》

[注十二] 弘历《御制诗序》

[注十三] 弘历《御制诗序》

[注十四] 弘历《御制诗序》

[注十五] 弘历《御制诗序》

[注十六] 王昶运《圆明园宫词》

[注十七] 引自 Malone 著《Summer Palaces of ching Dynasty》

[注十八] 王昶运《圆明园宫词》

[注十九] 弘历《惠山园八景诗序》

[注二十] 胤禛《圆明园记》

[注二十一] 弘历《圆明园后记》

[注二十二] 诗人席勒语，引自利奇温著《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之接触》

[注二十三] 见《教士书简集》，引自前书。

# 圆明园的毁灭及其现状

姚同珍

“海氛飏起连云屯，  
楼船逼近趋津门，  
将士无功宿卫散，  
仓皇一炬烟尘昏。”

——“王闿运《圆明园宫词》”

圆明园的兴起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文化的回光返照，是封建王朝最后的“盛世菁华”。圆明园的毁灭也有它深刻的政治背景，反映了清王朝的倾覆和灭亡。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入挑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接受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清朝政府为了偿付大宗赔款，对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亿万人民面临死亡的边缘。农民起义的浪潮一年一年高涨，终于暴发了反抗清朝封建统制的太平天国起义。英法侵略者在美国和沙俄的支持下，又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企图采取战争的手段来促使愚昧顽固的清朝政府与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扑灭中国人民的火焰，以扫清他们侵略中国的障碍。侵略者组织了对中国强盗式的进攻。1860年英法联军进抵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按照侵略者的说法：“圆明园乃是清帝所最宠爱的行宫，毁坏这个地方，对于他的骄傲和情感两方面，准定是一个大打击，决没有错”。（注1）在短短十数天中，侵略者先将园内的文化宝藏珍品抢劫殆尽，再放火将这座清王朝经营了一百多年、动用了浩大的财力和物力、集中了劳动人民的智慧而建设起来的圆明园付诸一炬。他们本想将三园全部烧光，但因范围太大，有的因地点偏处于北部或湖心，未能到达，侥幸留存了双鹤斋、蓬岛瑶台、海岳开襟、正觉寺等十多处。

有关圆明园被劫掠焚烧的记述很多，当年在中国恣意横行的侵略者们，他们的信函及对此战争的回忆录都充满了强盗行径的自白，例如英国侵略军统帅格蓝特十月七日之函叙及有关抢劫及分赃之详情：

“协派英法委员共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若者归英军，若者归法军，予命法国委员注意，先取在艺术及考古上最有价值之物品，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外务大臣）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第三）而藏之法国博物院（注2）。”

英军军医瑞尼在所著书中叙及：

“入园的第二天就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卒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毫无纪律”（注3）

英军步兵队长卧耳斯莱在所著书中叙述：“其中堆积如矿山似的财宝，和国内所有

各种珍奇物品，陈列在法军面前，任其肆意抢劫，一间一间的屋子充满着价值连城的物产，或系国产，或来自欧洲，一间一间的大厅，置有价值巨昂的瓶缸，还有储藏绸缎绣货的房子，也敞开在他们眼前，乱七八糟，立刻开始了予取予携的抢劫，肆意毁坏一切过于笨重，不能移动的物品”。（注4）

他们在疯狂地抢劫后，继而焚烧诸园。1860年10月17、18两日，英国侵略军马队三、四千人一齐出动，从圆明园开始，再转向西边的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等处一齐放火焚烧。当他们焚烧香山再回圆明园之后，又将仅存作侵略军司令部的正大光明殿一并焚毁。当时参与纵火者、目睹者和北京的居民记录下了圆明园诸园陷入一片火海的景象：“烟雾逐渐加大，并且越来越浓密，飘飘荡荡仿佛一片大的云彩罩盖北京，并且又象一个可怕的大风雨将要来临，当我们走近行宫的时候，火声劈拍劈拍的响着，很足使人震惊，并且穿过一重重烟雾，太阳照耀中天，使一切花草树木都带来了一种憔悴的病色，殷红的火焰，映在从事放火的军队的脸庞上，使他们看起来仿佛恶魔一样”（注5）。“此两日中，密黑之烟所成之浓云，横空笼罩于其上，往昔富丽华严之区域，而今已矣。有风自西北来，吹其烟团，直过我军营之上，而直抵北京城。相距虽远，而灰星直落城中巷衢，…此两日中，如有人行过吾兵营与圆明园之间，则见烟际之云，使天光黯晦，无殊日蚀，附近一带地方，亦皆黑暗云”。（注6）“放火将圆明园、三山（即玉泉山、万寿山、香山——编著）等处，全行烧毁。烟焰迷天，红光半壁。连烧五日五夜，不啻咸阳一炬。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抢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注7）。

“圆明园之火”受到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也受到全世界伸张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且看十九世纪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控诉吧。这是1861年11月25日雨果致巴特莱大尉的信，文章虽然长一些，但颇值得一读：

“您只管去想象那是一座令人心响神往的、如同月宫的城堡一样的建筑，夏宫〔即圆明园一译注〕就是这样的一座建筑……，为了创造它，需要两代人成年累月地进行劳动。这座庞大得跟一座城池一样的建筑是经过好几个世纪才建筑起来的，这是为什么人建筑的呢？是为世界各民族人民，因为这一切的时代是人民的时代。。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个个都知道这座夏宫，伏尔泰就提到过它，人们常常这样说：希腊有帕特农神殿，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东方有夏宫。没有亲眼看过它的人，那就尽管在想象中去想象它好了。这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无与伦比的杰作……这个神奇的世界现在不见了。有一次两个强盗撞入了夏宫，一个动手抢劫，一个把它付诸一炬，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掠夺，胜利者盗窃了夏宫的全部财富，然后彼此分赃，这一切所作所为，均出自额尔金之名，他们把对待帕特农神殿的手法搬出来对待夏宫。但是这一次作得更干脆，更是彻底，一扫而光，不留一物，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收藏在这个东方博物馆里不仅有杰出的艺术品，而且还保存有琳琅满目的金银制品，这真是一桩了不起的汗马功劳和一笔十得意的外快。有一个胜利者把一个个的口袋都塞得满满的，至于那另外的一个，也如法

泡制，装满了好几口箱子，之后，他们双双才手拉着手荣归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一段活动……在将来交付历史审判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会被人叫做法兰西，另一个——叫做英吉利……。法兰西帝国侵吞了一半宝物。现在，她居然无耻到这样的地步。还以所有者的身份把夏宫的这些美焕美伦的古代文物拿出来公开展览。我相信，总有这样一天——这一天，解放了的、而且把身上污浊洗刷干净的法兰西，将会把自己的脏物还给被劫夺的中国”。

现在正如一百多年前雨果信中所讲的，这些被劫的文物仍在国外流落着。巴黎国家图书馆现藏清代画家沈源唐岱于1744年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在巴黎枫丹白露宫有1863年拿破仑三世为存放从圆明园掠夺的大量珍贵文物专门建立的陈列馆，里面收藏着商周青铜器，明清官窑瓷器、明景泰蓝器、象牙、玉器、丝绣、盔甲等罕见的文物。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晋代大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唐人摹本）也是劫自圆明园……。从流落在国外的文物，可以看到我国这场文化上的浩劫的一些侧面，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掠夺圆明园的罪证。

重创之后，清朝统治者仍十分迷恋昔日腐败的生活，仍处心积虑地进行着圆明园的恢复活动。虽然这时清朝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在国内则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连年不断，财力已十分枯竭。就在“圆明园之火”的第十三个年头，同治十二年八月（1873），同治帝以奉养两宫太后为借口，决定重修圆明园，这次计划修建三千多间房屋，集中在圆明园与万春园。但由于国库空虚，财源枯竭，木料采集不易，加以统治阶级内部意见分歧，不得不于同治十三年九月下令停工。此时建筑工程进度不一，有的已大致完工，有的由于材料缺乏仅立梁架。

此次虽然停工，慈禧太后仍一直念念不忘于修复，有时也来园内游玩。甲午战争后，仍耗资修复园内“天地一家春”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修理“双鹤斋”等处，此后的小修一直不断。

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当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联军向中国发动进攻，中国人民又惨遭戮杀。法军、英军、义军、分驻朗润园、颐和园、玉泉山等地，圆明园又遭到一次浩劫，侵略军大多以园内部分修复的殿宇门窗当燃料，继之以清朝的旗兵勾结流氓恶霸，乘机把1860年幸存下的建筑物，以及同治、光绪时屡次修复的少数建筑物，再予以拆毁盗卖。最后仅剩“正觉寺”一座完整的建筑。连园内几万株名贵树木也尽遭砍伐盗卖。到了宣统末年，农民已逐渐在内开荒种地，一代名园已是“麦陇弥望，如行田野了”。

辛亥革命后，尽管封建王朝已被推翻，但在军阀横行以及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这座园林废墟仍继续遭到军阀、官僚、奸商、地痞、流氓肆无忌惮地摧残破坏，无数的砖瓦、石雕、碑刻以及各种建筑材料大规模地从园内盗走，一直盗运了二十多年。

“达园”就是军阀王怀庆占据了圆明园大宫门前的地盘，拆用了圆明园内舍卫城的砖、安佑宫的大墙、西洋楼的石刻门、狮子林的太湖石等建造的。军阀张作霖将园内的汉白玉盗去修他自己的墓穴。此外，还有许多精美的石雕、华表、太湖石等至今散落在北大、中山公园、北京图书馆等处。这时，劫后残余的圆明园废墟更是一片凄凉荒落、榛蒿满



目、狐兔出没的景象了。

建国初期，各项建设都在百废俱兴中。尚未能注意到圆明园的建设。此后不久，北京市开始做规划总图，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一直就把圆明园作为一块要发展的公园绿地予以保留。1956年北京园林局首次在圆明园造林六万五千余株，计274亩。在一片败墙颓垣，荒岭废墟之间，第一次出现了绿色树丛。1960年北京市园林局根据市规划局文件，向公社征收了园内全部旱地1200亩，在此征收的土地上大面积植树，先后共达69万株。为了保护文物古迹，1963年3月海淀区公布了“圆明园为区属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片面地理解以粮为纲的精神，1962年园林局将二年前已征用的土地部分借给公社。同年6月又将圆明园绿地及已征购的土地共1809亩及地上苗木72万株（1961年普查数）移交海淀区人委管理使用，后又经区人委同意再移交海淀区西苑大队管理使用，这样层层下放，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破坏情况。生产队只重视粮食生产，不关心树木，甚至为了生产粮食损害了树木，再加以人为盗伐等事件屡次发生，致使移交的72万株树木到1964年仅剩28万株了，因此1964年底海淀区人委又将借出给生产队的旱地及绿化用地重新收回，由海淀区成立绿化队加强管理。并协同园林局制定逐年发展的全面绿化规划，但未能付诸实现。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又给圆明园带来一次时间长、创伤重的灾难。一些单位及社队在圆明园内挖掘古建遗址、平地造田。毁林、强占绿地、违章建房等各种严重破坏事件不断发生。以致于到了1976年树木留剩的只有12万株了。在“备战”的名义下，把古建遗址石块等挖去，完整的土坡也被挖得残缺不全。居民和农民还在圆明园内乱建住房，此外工厂、修建工程队、马场、鸭厂、基建工程兵营等都在抢先占地或填湖扩张，特别是在圆明园被焚后唯一剩下的正觉寺建筑群，原为清华大学教职工宿舍（统称“喇嘛庙”），多年来保存尚好，但在短短这几年来内由于机械修建厂的占用，将原有的古建任意拆毁，珍贵的古松柏砍伐殆尽，参观者无不为之惋惜。（图19）

令人欣慰的是在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在海淀区建设局领导下成立了“圆明园管理处”。这是自圆明园被焚毁以来第一次建立的专门管理机构。开始进行整顿管理，做好宣传工作以及开展规划设计的研究，当然作好这项工作仍有不少矛盾和斗争，困难甚多。

对已成废墟的圆明园作好文物保护工作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文化意义，圆明园遗迹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近百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被列强欺凌的情况，对一些年青人来说是很抽象了，圆明园正好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这个遗迹可以告诉我们：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现在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存在。

圆明园在它的全盛时期，曾经是一个蜚声国内外的名园胜苑，今天圆明园的建筑虽已荡然，但遗迹尚存，特别是西洋楼由于是石造建筑，故遗物最多。对照法国人奥尔莱（Ernst Ohlmer）在1867年~1869年期间旅居北京时所摄的西洋楼遗址照片（图20），虽然现在又历经一百多年不断的拆毁和破坏，但仍可清晰地看出当时的规模。在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后不久，已重点在西洋楼清理了方外观的亭子、台基，又把失散在远瀛观大